

主 编 寄 语

在哀牢山少数民族村寨作田野调查，观察了一个哈尼族寨子举行的人生礼仪活动——婚礼。婚宴在小山村里举行，那天到的亲戚朋友有七百多人。一个三四十户的村子要容纳那么多人，要办七十多桌酒席，可整个婚礼组织得井井有条。村民在集体组织行为里体现出的高度的参与性与村落群体活动的自组织性使繁多的工作变得简约、直接。农耕文明“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一种制度性构建。而最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讨论一个学生是住在外面好，还是住在校园好，就要开多少次会，下多少次文件。我们的大学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们的制度安排的根本性缺陷就是失去了制度主体的参与性与自组织性。也就是大学制度越来越“衙门”化，使大学中人对大学本身丧失了伦理信任与情感归宿。

大学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在大学中的生存者对大学本身的信任危机与意义自残。世俗社会还一厢情愿地视大学为理想的圣地与净土，而知识传授者却在盘算着上课节数或“科研”字数与酬劳之间的对应关系，把“知识”当作经济收入来营销。象牙之塔比社会还功利，还世俗，还道貌岸然。学术在金钱下面腐败，学术在权力下面异化。大学的内在生命，是大学中人自己给掐死的。真怪不了谁。

大学原本是有理想的人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地方。它最忌讳的是谁称自己是权威和老大，如果没有任何程序和仪式就天生地安排谁是权威和老大，其实大学本身就死亡了，因为思想者常常是从质疑权威和挑战权威开始的。用当下流行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变成“知道分子”。我们现代的大学，已经制度性地安排了“权威”。一个科长要管住一个大学者的思想是容易的，因为你研究的问题我不懂，我不懂就没有社会意义，没有社会意义的问题还能让你研究吗？“科长”代表了社会权力，已经让思想者出局。这样的权力运作在大学不是司空见惯吗？

大学的制度安排，就是要使大学中人有高度的参与性与伦理精神保证的自组织性。这才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话说得太理想了，可是连大学都不谈理想，这个社会还正常吗？

……

值得高兴的是，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渐进关键之时，我们欣喜地听到了党和政府“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声音。那么，在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背景下，高等教育自身又当如何作为？高等学校个体又当如何作为？不同高校的领导人又当如何作为？置身于一线的高校教师和 researchers 们又当如何作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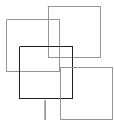
《云南高教论坛》第一辑终于面世，并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各位同仁。在云南省高教学会的直接领导下，《云南高教论坛》将以系列丛书的方式，架设起一个研究、探讨、分析和实验的理论平台，向云南高等教育一线的教师、研究者和管理者全面开放，供每一位关心云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仁人志士抒发笔墨，指点迷津。

换一个角度来说，没有更多的人参与，就难以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缺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失去导引和警示的方向标，而一旦失去对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参谋价值，本书亦将失去编撰的意义，因此，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云南高教论坛》的存在。

云南的高等教育，我们不关心，谁关心？我们不研究，谁研究？我们不实践，谁实践？

2004年10月15日

学术论坛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与融通

——对大学管理组织架构中一对核心矛盾的看法

吴 松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权力”就是一个敏感而又诱人的词，引得罗素（B. Rusell）、霍布斯（T. Hobbes）、吉登斯（A. Giddens）、韦伯（M. Weber）、帕森斯（T. Parsons）、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古今中外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内涵和外延。在一个由学科和行政单位组成的大学矩阵结构中，组织人员均处于行政与学术的双重权力之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伴大学的产生而产生，相伴大学的发展而发展。与此相应，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这两只无形的手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大学人的取向。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大学的这两种权力及其关系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突出的实践难题。作为两种权力见证人的高校管理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仅就个人的思考谈点粗浅的认识。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毋庸置疑，中国大学中具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同时，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大学学术权力中存在着某种游戏规则。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顿·克拉克（B. Clark）在描述学术权力（academic authority）形式时，列出了四种不同的权力^①：（1）扎根于学科的权力，包括个人统治、学院式统治、行会权力、专业权力；（2）院校权力，包括董事权力和官僚权力；（3）系统权力，包括官僚权力、政治权力、全系统学术权威人士权力；（4）感召力（Cha-

^① Clark, Burton R.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M].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10-125.

risma, 魅力型权威, 也称卡里斯玛权威)。

虽然克拉克提出了“学术权力”的概念和命题,但他着重研究的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权力问题,而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权力组织结构,这或许是与西方大学的学术背景和体制特征有关。克拉克认为,在大陆模式、美国模式、英国模式与日本模式中,每种不同权力层次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权力^①。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认为,学术领域中存在着两种权力以及相应的两种学术资本,那就是特殊权力导致的“纯粹”学术资本和世俗权力以及制度化权力导致的制度化资本^②。

众所周知,大学存在着由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组成的二元结构,存在着两大权力体系:一是以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的行政权力系统,包括大学、行政和群众组织;二是以教授、专家和学者为核心,以各种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为特征的学术权力系统^③。行政权力表现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 Weber)所描述的组织的多层化特征,一般分为校、院、系三个等级。三者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合法化的权力体系,维持着大学的日常运作。而学术权力则是因为学者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而自发形成的一种学术魅力,一般是自下而上的、合理化的权力系统,既有权威性,更有内聚力。

这两种权力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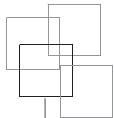
从实质上看,行政权力的核心是“力(power)”,而学术权力的核心是“理(truth)”。在行政权力领域,“官”大“力”就大,它是一种统治力与领导力,富有层次性和隶属性。比如,大学校长的地位比处长的地位高,权力范围比处长宽。而在学术权力领域则是“理”正“力”就强,它既无统治力,也无层次性,更无隶属关系。“学术权力”是相对行政权力的一种客观存在。拥有学术权力的杰出人士相当于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卡里斯玛(Christmas)^④。

① Clark, Burton R.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M].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25-131.

② [法]皮埃尔·布迪厄著,陈洪捷译:《论使用科学(科学场域的临床社会学)》。

③ 参考[加]约翰·范德格拉夫著,王承绪等译:《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④ 韦伯认为卡里斯玛具有下列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



从运作方面看，行政权力起外在决定作用，而学术权力起内在支配作用。行政管理的中心是上层，一般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而学术管理的重心在基层，一般实行自下而上的管理。行政机制运行的特点具有组织性、网络性和隶属性，便于统一指挥；在决策时，往往侧重于“要”与“不要”的系统指令和组织需要，必须体现政治性、社会性和纪律性。而学术机制作用一般处于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organized anarchy）”^①状态之中。在作出决策时，一般更侧重于“该”与“不该”的学理依据必须体现科学价值和学术水平。行政权力虽起决定作用，但作用的时空范围局限性较大，只能在特定范围、特定时间、特定对象条件下起作用。而学术权力则不然，它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影响，像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人的影响既无国界，又无时间约束，这些权威既影响了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从价值取向看，行政权力追求效率和约束，而学术权力追求平等和自由。行政权力的价值表现为执行政策、服务协调并以对管理效率的追求为己任，其主要特征是统一和服从。而学术权力的价值则表现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并以对社会的终极关怀为己任，其主要特征是求异和超越。同时，行政权力的实现依赖于规章制度下等级组织的构建以及对组织等级的遵从。因此要求严密而有层次，甚至是非人格化的、不自由的管理。而学术权力体现一种相对轻松、自由甚至无政府的环境，使学术人员能超越现实的压力而冷静和自由地思考和探究问题。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元结构共同维系着大学系统的运行。学术权力作为一种内在力量发挥着支撑作用，行政权力则作为一种外在的结构形式维系着高等学校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正确地对待和区分二者的关系，才能有利于学术活动的发展及大学整体的运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相对独立。由此，构成了大学管理现实中的“两种权力博弈”现象。大学所独有的特殊目标、特殊群体、特殊位置、特殊活动方式等决定了学术权力的合理性；而大学作为社会组织之一的特性也决定了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同时，两者的存在都有其客观必然性，而它们自身的特性又决定了各自的局限性。于是，两种权力的合理性、合法性、局限性交织在一起，便决

^① Cohen, Michael and March, James (1974) *Leadership and Ambiguity: 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科恩和马奇在《领导与模糊性》中认为，当把一个系统描述成为一个任何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模型时，就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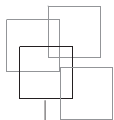
定了二者总是处于冲突与协调的制衡状态之中。

两种权力之现状

从理论上讲，大学校长既拥有行政权力也拥有学术权力，他们是各种权力的集合者和驾驭者，一般说来应该便于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但是，两种权力在现实中的关系并不尽如人意。在大学的运行过程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常常不如我们所理想那样的和谐，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有资料显示，在被调查的 12 个国家中，有一半国家 2/3 的被调查者认为，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关系只是“平常”或“很差”。而在大学的运行过程中，认为双方关系“非常好”的没有达到 10%^①。在当今中国大学中，其关系表现包括：

在价值观念上，权力出现“越位”。在当今大学中，目标价值不仅出现分化，而且主次发生了位移。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介入过多，越俎代庖形成了强力控制。这种“以政代学”和“政学不分”的现象削弱了对大学来说赖以生存的学术权力，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大学的自我适应机制。官本位现象突出，大学按行政级别分等，按行政规则运行，教授作用在大学发挥不够。从理论上讲，没有教学与研究活动何以组成学校？没有学校，行政结构何以存在？而今天的逻辑已经模糊，支撑大学运转的不是学术权力，而是行政权力。本来作为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行政权力，如今在一定程度上却成了制约学术发展的枷锁和学校发展的包袱。

在权力重心上，两种权力主体出现错位。大学中，教学与科研人员本应当是学校主体，可行政人员执行权力意志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自主发展能力。行政权力过于显赫，学术权力相对削弱，容易导致教师、学者弱化主人翁意识和学术责任感、行政部门意志过于突出必然会忽视大学学术的特点，难以发挥专家和专家委员会在大学中的应有作用。主体错位与行政权力泛化的直接后果是主体本末倒置，行政人员成了支配学校的核心，学术权力在表面上被推崇而在实际上失语。在大学内，一个处长的发言权远远大于教授，流行的话语“官大学问大”就是其生动写照。成为“某某长”之后，职称、经费、成果该有不该有的都会有。此外，拿文凭、捞学位、谋取学术头衔以及出书、评职称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一些教师不安于做学



问，而更愿意当官，热衷于拉关系、走后门、立门派等旁门左道。

在资源调配上，行政权力成为当然的中心。受计划体制的影响，行政机构臃肿，部门繁多，导致了非教学、科研人员膨胀，分解了教学科研活动应享有的教育资源。大量资源消耗于非教学科研的行政和准行政行为。更加无奈的是，学术权力必须依赖行政权力才能实现其职能的最大化。这种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教育和学术资源配置传统在我国大学管理中绵延不止成了不争的事实，其后果必将影响大学作为思想传播和思想原创地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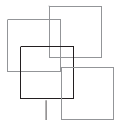
总体上看，当今中国大学虽然不断倡导“学术兴校”思想，但行政权力过多介入学术事务而不断侵蚀甚至替代学术权力的现象依旧十分普遍，学术权力有时候甚至被排斥在对学术事务的管理之外。我们可以把此种现象称为“学术权力弱化症”。此种学术权力失灵的状况不仅有其内部的、历史的原因，更有其外在的环境影响和体制根源。这种现象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无限政府”如出一辙。政府的角色是多重而混淆的，既是大学的举办者，又是行政管理者，还是事实上的办学。这种多重合一的角色必然导致大学中的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弱化症”事实上正在而且也必将继续阻碍中国大学的发展。

两种权力之融通

要消除“学术权力弱化症”，在大学管理实践中明确区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并非易事。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是一体两面，相互作用，交缠一起，很难划分。就大原则而言，大学校长在管理中不可以偏废一方。但就目前问题而言，特别要警惕行政权力的滥用，要在管理组织系统中努力淡化二者之“博弈”关系，构建起“志”同而“形式”不同的融通体系。为此，首先需要检讨与削弱现行管理中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官僚模式”（或称为科层模式），其次是要放弃单一以学术权力为中心的“同僚模式”（或学院模式），转而采取兼顾两者的“协调模式”。

强化学术权力，构建学术与行政二元权力分工明确、相互协调和制衡的运行机制是我们在管理体制改革的努力方向。在考虑发展决策时，我们应该牢记“学术兴校”的主导方向，并有效调度行政手段以资辅助，合理匹配两种权力系统，努力做到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管理就是服务”的要求。校长当然要以身作则，既要建构行政权威更要建构学术权威。

就目前情况看，将行政权力及管理目标定位于从属和服务的角度不仅是



现党的领导?”^①。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我国高校的根本领导体制，我们无疑应当坚定不移的坚持实行，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坚持实行这一制度的前提下，如何把党委领导、行政管理与教授治学、民主治校有机统一起来，建立和实行教授委员会决策制度，仍是我们应该下工夫抓紧探索和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

“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校园内部谁的手在控制。”^② 大学具有行政事业管理与学术管理的双重属性，再加上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这就使得中国大学的校长在调动各种资源、推动学校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高的学识、更强的能力、更无畏的勇气和献身的精神，否则，纵横交错的复杂权力系统一旦失衡，大学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倒退。我们唯有用心探索，用努力工作，力求通过合理划分权力，使各管理主体都有其相对稳定的权力范围，且不同管理主体的权力又能相互补充、相互制衡、协调配合，最终通过管理权力的平衡实现双赢的局面，以求在构建中国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征途上迈出坚定有力的实质性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加] 约翰·范德格拉夫著，王承绪等译：《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Clark, Burton R.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M].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年。
3. 张德祥：《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作者简介】 吴松（1958— ），男，云南镇雄人，云南大学校长，教授、博导、博士，从事哲学史及经济史及高教研究。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Eric Ashby. *Adapting Universities to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M]. San Francisco, Washington, London: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74: 59.

教育的真理大道

——《学记》在教育史中的价值

张祖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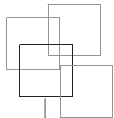
摘要：《学记》是战国晚期“百家争鸣”在教育思想上结出的硕果，《学记》继承和吸收了儒、墨、荀、法诸家的思想精华，是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科学巨著。《学记》洋溢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包含着朴素的民主主义和人民性，《学记》昭示着教育的真理大道。在“科教兴国”的新时期，《学记》必将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关键词：教育 真理大道 《学记》 价值

一、教学贵在“善喻”

《学记》全文分为十九个自然段，其中有十三个自然段是专门讨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的，占很大比重。这些讨论的核心思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由孔子开创的启发式教学原则，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学记》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提出的启发式教学原则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提出了“喻”的概念。《学记》指出：“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这段话是对“喻”的含义的解释，意思是说：“所以说一个好教师（君子）的教学就是要对学生进行晓喻和开导，即在前面引导学生前进而不是牵着他走；教的时候稍带一点强制性，勉励而不是抑止学生的积极性；要善于开启学生思考而不要把道理全部说光。这样就能使师生间的关系亲切融洽，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师生关系融洽，学生不感到学习困难，有疑难又能运用独立思维去解决，能这样才可算是善于启发诱导。”这段话把“喻”的含义说得十分透彻、生动、发人深省。《辞源》对“喻”字的解释是：“1. 晓喻，开导。2. 明白，知道。3. 说明。4. 比喻。5. 姓。6. 愉快。通‘愉’。”^①因此，决不能仅仅认为“喻”只包含“比喻、说明、晓喻、明白、开导”这样一些意



思,“喻”和“愉”相通,还包含着“愉快”的意思,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庄子著作中的“喻”字就有“愉快”的含义。作为战国晚期著作的《学记》,所用“喻”字包含“愉快”的意思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在这里“愉快”可引申出“积极、主动”的意思。不仅如此,我认为“喻”还是《学记》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综观全篇,“喻”这个词在《学记》中多次出现,含义十分丰富和深刻。

首先,从文章的逻辑结构来看,“喻”的概念的提出是在作者总结了“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各种情况和经验之后提出来的,是在“当其时”、“知其心”、“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这些概念提出来之后再进一步提出来的带有总括性和全局性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对孔子开创的“启发式”教学的总结和发展。“君子之教喻也”,“喻”的教学即教师了解学生,启发、调动、鼓励学生积极主动、愉快地学习的教学;最终能使学生“继其志”、“学为君”的教学,是生动、活泼、成功的教学。

第二,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效果究竟如何,由不得老师自己主观的认为来判定,而要由施教后的对象或主体——学生的状况来衡量,即通过教师的教育,学生的才能和道德是否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是,学生能否继承老师的志向,积极主动地愉快地学习,最终成为国家需要的接班人?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学记》对孔子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化和提高。“喻”的原则就是启发式教学原则,“喻”的原则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喻”的原则包含着“教学方法”、“教学能力(或素质)”、“教学目的”和“教学效果”的高度的内在的统一。在教育中,教学的“方法”、“能力”、“目的”和“效果”、“制度”、“管理”等是不能割裂的,这是一个重要原理。当然,也可以把所有这些都视为宏观的“教”的整个方面。

第三,综观《学记》全篇,教育的地位、目的、意义、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等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一个整体。

教育的目的和作用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所以学为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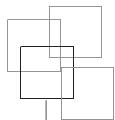
教育制度是:“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不躐等”,大学教育九年,教学要循序渐进,不可超越阶段。要按时进行考核。从开学典礼开始,就要敬重师道,让学生恭顺学业,还要有必要的惩罚手段来保证:“入学鼓箠,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课程制度是:“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即正课学习与课外作业两者并重。“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

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强调教学取潜移默化之功，学习贵有良好的环境，必要的实习和社会实践对学习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所有这些，都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如果教师能够进行“善喻”的教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才能顺利实现。所以，“喻”的教学即启发式教学的实现还要靠各方面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来保证和促进，这对教育的管理者来说（如大学校长），是应该很好研究的。

第四，《学记》还在中外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概念和理论。《学记》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意思是说：“学生学习时会认识到自己学识的不足，教师教人时也会发现有困惑不解的地方。知道自己的不足然后能自我反省，继续努力学习上进；知道自己有困惑的地方然后能自强不息。所以说，教与学两方面是互相补益互相促进的。《兑命》这篇文章说：当教人的时候，一半在教，一半在学；在学习的时候，一半靠人教，一半靠自学。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教学相长”的理论是“喻”的教学即启发式教学的一个更深的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它向我们揭示了“教”与“学”，是辩证统一不断发展的，教师要做到“善喻”，应该懂得“教学相长”的道理，不断学习充实和提高自己，学习也应该是主动积极的。

第五，要做到“善喻”，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学记》说：“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即教师的语言应当简练而透彻，说理微妙而精当，举例不多而诱导得体。这样就会使学生自觉地跟着教师所指引的路子学习了。《学记》还强调教师应该善于向学生提问：“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说的是善于提问的教师就像攻治坚硬的木头一样，先从容易处开始，最后处理关节要害，等到时间久了，学生就容易理解和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了。不善于提问的人与此相反。教师还要善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是说善于回答问题的人好像撞钟一样，叩打的力量小的就会发出小鸣，叩打的力量大的就会发出大鸣；击打得从容不迫，然后才能尽其余声。不善于回答问题的人与此相反。这些都是增进学问的道理啊。《学记》还指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是说仅靠记诵资料来讲学，是不够资格给人当老师的。总之，要做到“善喻”、“博喻”，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而只有经过“善喻”、“博喻”的教师的教育，才



能实现教育的目的，正如《学记》说的：“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所以，教师的教学在整个教育活动中居于核心和前沿的地位，《学记》用大部分篇幅来讨论教师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就毫不奇怪了。《学记》深刻揭示了教育的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和规律，《学记》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教育水平提高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才有后劲。”^① 创新是人才主动、积极的精神状态和实践活动，被动的、懒惰的、麻木的人是不可能创新的。如果我们的大学不能培养和引导学生积极主动亦即愉快地学习，是不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的。人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准确地说：“善喻”的教师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二、《学记》在教育史中的地位和价值

《学记》是我国古代一篇优秀的教育论文，全文仅 1929 字，却把我国古代教育的目的、任务和作用，教育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教育制度、课程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尊师重教的重要性等教育领域里的几乎所有主要问题，论说得全面、透彻、深刻、隽永。《学记》写成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晚期，是中国以及世界教育史上最早、体系最完整、最系统的教育理论专著，比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一书早三百多年，比 17 世纪捷克斯洛伐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要早一千八百多年。有论者说得好：“从《学记》的整个思想体系看，完全可以视为一部《教育学》的雏形，在教育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② 对后世教育产生了全面、深刻和持久的影响，乃至历代教育都把《学记》“奉为法戒”。《学记》的思想理论还远播海外，在世界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日本学者认为：《学记》“对日本教育史所发生的影响，是极为罕见的。”时至今日，“仍然指示着昭著的真理大道，”“其本身是具有永久性的存在。”^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外教育史上，至今无法找到能与《学记》媲美的教育论著。是什么赋予《学记》永久的魅力的呢？我以为这主要是由于：

①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第 269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

②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 367 页、387 页。

③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 367 页、387 页。

胜天……”^①而且，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和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周王室的衰微和奴隶制的没落，各诸侯国互相争霸，谁都想重新统一中国，建立新的强大的王朝。因此，各诸侯国都在纷纷寻找和网罗能为他们的称霸和统一中国服务的各种思想和人才，这是“百家争鸣”得以出现的政治、经济原因。于是，各派人物纷纷吮吸历史文化精华，各家学说不断总结古今圣贤睿智，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学记》正是“百家争鸣”结出的累累硕果之一。马克思说得对：“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②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可能长久延续下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墨等均遭浩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记》（《学记》是其中一篇）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学记》对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在封建社会，《学记》中的很多思想仅仅是一种理想，是难以得到实现的。就拿“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一条来说，封建社会的中国就从未实现过，广大老百姓在封建社会更多的是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甚至杀戮，很少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上“大学”了。

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科教兴国”才能真正成为立国的基本国策，指引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于“百家争鸣”时代，饱含着中华文化精华的《学记》，必然会在新的历史时代重新焕发出她青春的活力，全面深入地发掘和弘扬《学记》的光辉思想也就必然成为“科教兴国”伟大事业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作者简介】张祖训（1947— ），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和教育理论的研究。

①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第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